

The Third Model: On Habermas' Theory of Deliberative Politics

刘建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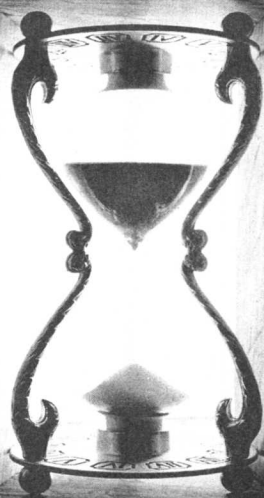
第三种模式

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Third Model: On Habermas' Theory of Deliberative Politics

刘建成 著



第三种模式

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三种模式：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研究 / 刘建成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
ISBN 978 - 7 - 5004 - 6387 - 0

I. 第… II. 刘… III. 哈贝马斯, J. - 政治理论 - 研究
IV. B516.6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6552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冯 赛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2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话语政治是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首倡的概念。话语政治理论的产生，有着现实的社会政治背景。自上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整个世界社会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全球化趋势已经出现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上。尤为严重的是，全球化已经触及到民族国家内公民团结的文化基础，严重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社会融合作用。此外，上世纪末的国际舞台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变故，诸如苏东解体、海湾战争、中东冲突、两德统一等，这给国际形势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对世界的未来产生了难以预料的影响。在此背景下，重塑公民团结的文化基础，成为政治社会的时代主题。面对这一主题，后现代主义批判甚至全盘否定了作为民主法治社会政治理念之基础的启蒙的政治理性。哈贝马斯则不然。他认为，启蒙运动尽管有很大缺点，但其政治理性的理想仍具有积极的意义。由此，对政治理性的追寻也便成为话语政治理论的思想主旨以及逻辑前提。话语政治理论是哈贝马斯基于交往行为理论而对启蒙的政治理性的重建。话语政治理论试图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出发，为整合多元社会冲突，追求时代政治正义寻找令人满意的规范视角。

对哈贝马斯话语政治理论的研究，在国外已进行得比较深入；而在国内，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哈贝马斯的学术思想随着其几部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引起了国内

学界的关注，开始出现评介性的论著。但在这十几年间，对哈贝马斯学术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交往行为理论、话语伦理理论和现代性理论方面。2001年哈贝马斯的访华，则形成了对其政治哲学思想研究的契机。但总的来看，国内对话语政治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刘建成博士的《第三种模式——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研究》一书，从政治哲学的视域，对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所进行的阐释与解读，便是从整体上进一步研究话语政治思想的一个尝试。本书以政治理性的追寻为起点，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论述了复杂社会条件下政治理性的演进过程，讨论了话语政治理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政治理性意义，以及话语政治理论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特别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地位。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是话语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本书从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公共领域与政治系统、交往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两种政治理论模式，讨论了话语政治的程序主义民主模式思想；通过考察理性道德法和实证法理论的不足，阐释了话语政治的程序法思想；通过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观、罗尔斯的万民法的比较，对话语政治理论关于全球民主治理体制的设想进行了评析。此外，还通过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对比，揭示了话语政治理论中所存在的缺陷。这些都是本书在理论上所作的推进。

政治哲学理论的研究是有着强烈的实践兴趣的。事实上，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便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研究内容也在逐步深化。近年来，学界对一系列政治价值范畴进行了讨论，就寻求合理的价值关系并为之建立科学的理论依据展开了争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也迫切需要我们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和建

构国际政治秩序的理性道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继承和发展古今中外政治文化的建构过程。就此而论，话语政治思想当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理论资源。这也是本项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王南湜

2007 年夏于南开大学

目 录

序言	王南湜 (1)
导论	(1)
第一章 政治理性的追寻	(18)
第一节 启蒙的政治理性与反启蒙	(18)
第二节 话语政治的重建	(29)
第三节 话语政治的理论基础	(39)
第四节 话语政治的基本特征	(48)
第二章 话语政治的国家理论	(57)
第一节 市民社会与国家	(57)
第二节 公共性	(68)
第三节 交往权力与行政权力	(77)
第四节 现代国家的合法性	(90)
第三章 话语政治理论的民主概念	(104)
第一节 民主规范模式的重建	(104)
第二节 自由主义民主	(117)
第三节 共和主义民主	(127)
第四节 话语政治的程序主义民主	(138)

第四章 话语政治的法理论	(151)
第一节 多元的权利基础	(151)
第二节 法的祛魅与现代法的合法性	(164)
第三节 法律与政治、道德的关系	(178)
第四节 法律商谈程序的合理性	(189)
第五章 世界乌托邦的理性道路	(202)
第一节 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	(202)
第二节 罗尔斯的万民法	(213)
第三节 民族国家和世界公民社会	(222)
第四节 话语政治与全球秩序	(231)
第六章 批判理论的批判	(245)
第一节 理论的超越	(245)
第二节 话语政治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256)
第三节 话语政治理论的重负	(267)
结束语 话语政治理论与中国的政治文明之路	(278)
主要参考文献	(289)
后记	(298)

导 论

—

本书的直接目标是从总体上把握和理解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即第三种模式——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本文中“从总体上理解”的含义是指梳理哈贝马斯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对包含在哈贝马斯话语政治理论中的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法理论以及世界社会的和平构想进行系统而全面的阐释。所谓话语政治，就是在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中，在话语合理化力量的推动下，通过制度化的法律媒介，以旨在实现生活世界合理化和对传统的价值和规范进行占有为目的的民主意见和意志形成程序。而所谓“第三种模式”，则在于突出哈贝马斯话语政治理论的特征，从社会实践的方面说，它是介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属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论诉求；从对民主政治理解模式的方面说，它是介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解模式和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解模式之间的程序主义政治理解模式；从法理论方面说，它用交往参与者的话语实践取代了契约的私法模式，在观察者和参与者之外引入了第三种视角，即道德视角，试图克服传统法实证主义和自然法之争，形成程序主义的商谈法律理论。这样，从规范的意义上，话语政治理论把重心从金钱、行政权力转移到团结上面，以使金钱、行政权力和团结这三种资源共同满足现代社会的一体化要求和控制要求。

20 世纪末的国际舞台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变故：苏东解体、海湾战争、中东冲突和两德统一。这些变故给国际形势带来巨大变化，也对世界的未来产生了难以预料的影响。这无疑成为哈贝马斯关注政治问题的直接诱因。然而，细细探究，我们会发现除了促使哈贝马斯作出政治思考的直接诱因以外，更多的是潜藏于其理论深处的理性重任。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说我还保留了一点点乌托邦的话，那完全是因为我相信，民主、自由和公正——此外还有关于它的最佳实现途径的公开辩论——能够解开当今世界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戈尔迪之结。我不敢肯定我们会成功，甚至不知道我们能否成功，但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才必须尝试一下。”^① 话语政治理论便是哈贝马斯为解开戈尔迪斯之结（Gordian knot）在政治哲学上的探索。^② 归结起来，哈贝马斯话语政治理论的形成大致可以看作以下三个方面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首先，多元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

当今社会是个多元社会，其中的多元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国家日益组成一个跨国家的统一体，世界社会最终形成一个风险共同体。多元社会加速发展的趋势促使了人们全球化意识的觉醒。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就对科学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给生活世界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整个世界社会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且全球化趋势已出现在不同层面上。全球化趋势中最重要的是经济

① 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 页。

② 戈尔迪之结：戈尔迪斯（Gordius）是古代费吕加国王。在古希腊神话中，能解开戈尔迪斯之结者就可以当亚细亚国王，后来此结被亚历山大大帝解开。后人常用“戈尔迪斯之结”比喻难题、难事，或者问题或故事情节的关键、焦点。

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加强；跨国公司数量急剧上升；世界生产的一体化以及金融市场的独立化趋势。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表达了一种动态的图景，动摇了时空层面上的限制。吉登斯把这一过程描述为：“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互动情势。”^① 时空分离导致了社会系统的脱域问题。^② 这一新的动态结构使得民族国家从“一定领土范围内的统治者”转变为“掌握速度的大师”。哈贝马斯归纳了全球化过程对民族国家带来的四个方面影响，即全球化直接影响了管理国家法律安全和管理效率、地域国家的主权、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以及民族国家的民主合法性。全球化过程削弱了民族国家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已经触及到民族国家范围内形成的公民团结的文化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多元社会并没有扩大主体间的世界，也没有通过话语把一些重要的观点、主题等联系起来，主体的意识在扩展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散乱。由因特网制造的公共领域像地球村落一样，划分为彼此不同的诸多领域。暂时尚不清楚：“公共意识是否还能调控已经彻底分化的各种关系，或者，已经独立的各个系统是否会切断由政治交往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③ 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质，作为与现代国家制度一起发挥作用的经济动力，它也为民族国家的确立做出了贡献。但二者的发展很快就不再相互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战略都

①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 页。

② 在吉登斯看来，所谓脱域，就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吉登斯在其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社会的脱域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哈贝马斯把吉登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国际关系的紧密化，其结果导致本地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相互作用。

③ 哈贝马斯：《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1 页。

把连为一体的国际金融市场和劳动市场作为决策依据，这种趋向慢慢影响到了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全球化已使政治手段很难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面对这一趋势，哈贝马斯期待世界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出现，渴望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而这一切出现的前提在于，“我们必须为解决那些棘手的冲突寻找到令人满意的规范视角”。^①

其次，传统政治理解模式合法性的丧失。

在哈贝马斯看来，基于对民主进程的不同理解，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理解模式，即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解模式和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解模式。两者的对立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其一，在民主进程的作用上，“自由主义”认为，民主进程的作用在于根据社会的不同利益来安排国家，其中，国家是公共管理机器，社会是私人及其社会劳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交换的系统。共和主义则认为，政治的功能不仅仅在于管理；相反，政治是整个社会化进程的构成因素。政治是一种道德生活关系的反思形式，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意志，无论从发生或规范的角度，都应当享有优先性。其二，在公民概念上，自由主义认为，公民的地位是由主体权利确定的，而主体权利是公民面对国家和其他公民所固有的。作为主体权利的承担者，公民受国家的保护，只要他们在法律范围内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就不受国家的非法干预。主体权利是消极权利，它们确保法人在一定的活动范围内不会受到外部强制。共和主义认为，公民的地位不能按照消极自由的模式来确定，因为消极自由是私人所享有的。公民权主要是政治参与权和政治交往权，因而更多的是积极自由。其三，在法律概念上，自由主义认为，法律秩序的意义在于明确具体情况下一主体所具有的实际权利；共和主义则认为，这些主体权利应归功于一种

①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客观的法律秩序，它促使并确保公民在平等、自主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共同生活，并达成一致。在前者看来，法律秩序建立在主体权利基础上；而在后者看来，主体权利的客观内涵更重要一些。其四，在政治意志形成过程的本质上，自由主义认为，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围绕着行政权力而展开的不同立场之间的斗争。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受到策略行为者的集体干预，结果则是以选民对于个人和纲领的赞成来衡量。共和主义认为，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不是依循市场的结构，而是一种独特的公共交往结构，其目的是为了达成“沟通”。政治范式的本质不在于市场，而是“对话”。

哈贝马斯与自由主义的理解对立，认为它只专注于工具性政治理解上，失去了政治的规范意义。同时，他对共和主义的理解也不满意，认为“共和主义民主模式既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优点在于，坚持通过交往把公民联合起来，并坚持社会自我组织的激进民主意义，而且不把集体目标完全还原为不同私人利益之间的‘调和’。不足则是过于理想化，并让民主过程依附于公民的道德趋向。”于是，哈贝马斯说：“我想提出第三种民主模式，它正是建立在一些交往前提之上，有了这些交往前提，政治过程就可以预测到它会带来的理性后果，因为它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上表现为话语样式。”^① 哈贝马斯更愿意称之为“话语政治”。

第三，交往行为理论的实践应用。

可以说，哈贝马斯毕其一生建立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一个要旨，是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事业”并未走到穷途末路。面对科技理性对现代社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当然要批判现代社会结构对人类的压抑，但这些批判要与正确地理解结合起来才能触及到问题的核

^① 哈贝马斯：《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

心。西方社会发展至今，科技理性几乎控制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历史发展的事实。但面对这一事实我们也不必片面地以悲观的眼光来对待，只要我们采取另一个分析角度，事物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哈贝马斯以“理性讨论”这个概念来确立交往行为与理性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理由，认定交往行为比策略性行为优胜。为了说明交往行为与理性相连，哈贝马斯又进一步发展了“理性讨论”（rational discourse）模式，来塑造交往行为与理性的内在关联。交往行为理论强调的交往理性是分散在真、善、美三个领域的理性的基础，而语言则是交往理性的载体。基于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建构了一个理想模式，提出了一个新的“乌托邦”。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理想模式应是以“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共同体的民主的自我组织”为其“规范的核心”的社会。这一理想社会是建立在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交往理性上的，它不再是以目的合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而是没有暴力的以“自我实现和自主权”为基础的“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

正是依据其交往行为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哈贝马斯开始把理论的视角触向国际社会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从而把他的理论推进到实践领域，创立了庞大的法哲学体系和政治哲学体系。因此，可以说，话语政治理论的提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

二

在国外，对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研究要早于国内，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超过国内，其主要特征是多样化，表现为对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研究的价值立场上的极不统一。尤为复杂的是，很多学者尽管并非对哈贝马斯政治哲学做专题式研究，但都不可避免地

要涉及话语政治的问题。因此,这里只能通过选取不同的思想阵营的方式来概括性地介绍国外学者研究哈贝马斯话语政治理论的现状。

首先,以利奥塔为主要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研究。利奥塔对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哈贝马斯的同一性理论。建立在话语合理性基础上的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话语政治理论的基石,按照利奥塔的观点,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将单个的语言游戏联结在一起的普遍实践或普遍语法,因此,通过符号而中介化的“各种生活形式”的差别或传播在实践上也是无法克服的。利奥塔把哈贝马斯所坚持的“同一性理论”看作过时的元论证,认为它与启蒙主义者的“理性”、唯心主义者的“绝对精神”、劳动阶级的“主体”、弗雷格的“概念著作”、胡塞尔或维也纳小组的“普遍的科学语言”、结构主义者以及转型语法学家和系统理论家的“体系”一样,都是在近代趋向“掌权范式”的潮流中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中仅仅以不同方式建立起来的普遍理性的总谱。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具有一个不被束缚的对于有效性的普遍要求,以及天然伴随着这个要求的一个野心。^①利奥塔认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将意义问题与某种社会同一性联系在一起,这个同一性以其自身合乎理性的缘故,必须同时被思考为普遍的,这就导致它一开始就强迫人们屈服于一种规范理念。按照利奥塔的理解,只要不存在无需最终裁判机构的永无休止地继续讨论的自由,那些形式上的所谓以论证达成同一性的规则,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些具体的预先规定,这些规定由于其普遍主义的野心而不愿放弃整体性的特征。因此,在政治上,利奥塔怀疑哈贝马斯

^① 参见弗拉克:《理解的界限——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精神对话》,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3页。

的理论具有官僚主义工具的特征。利奥塔认为，哈贝马斯强调共识在交往行为中的核心地位，抹杀了异质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有乌托邦集权主义的嫌疑。利奥塔的批判多少代表着后现代主义对哈贝马斯的共同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思想是很不现实的。

其次，以莱恩、查莱特为代表的女权主义和神学界的研究。莱恩从女权主义角度对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进行了研究，而查莱特则主要从神学角度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范畴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女性和宗教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遭到彻底否定，由此，哈贝马斯作为德国思想史及至西方思想史的传人，仍旧固守“西方中心论”，这严重有违于他的交往理性。“理性讨论”强调通过论据来证明宣称的有效性，这其实预设了议论能力的重要性，但哈氏忽视了这一模式在男性中心社会的性别含义，显示了他理论里的性别盲（gender-blindness）。^① 道德判断所依赖的，并非抽象的理性思维，而是从具体处境出发，考虑当中所牵涉的具体需要和后果。^② 应该说，所有这些质疑是富有见地和中肯的，这也促使了哈贝马斯后期思想向着“神学”和“多元文化”的转向。

第三，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研究。这些学者考察了哈贝马斯关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公正的，实现了人的基本权利、人们之间和谐相处的“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的设想，并对哈贝马斯理论中明显的理性化色彩提出质疑。约翰·罗尔斯认为，这种理想化集中体现在哈贝马斯程序理性价值的根本诉求中，这些诉求仅停留在理论上，与现实的价值判断和具体

① 黄结梅：《解构哈贝马斯重建批判基础的工程》，载阮新邦等主编《解读〈沟通行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② 参见S. K. 怀特：《政治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的国际政治环境相脱离，因而是空洞、抽象的，要将它们运用于世界政治中去，会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和阻力。罗尔斯认为，所谓正义，只能在一种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文化内部得到实现，由于基本价值的巨大差异，对正义的理解不可能达到全人类的共识。而哈贝马斯却试图使他的话语政治理论建立在跨民族、跨文化的广度上。

第四，以耐格特和克鲁格等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早在1972年，左翼代表耐格特和克鲁格就针对哈贝马斯发表了《公共领域与经验——对市民阶级公共领域和无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分析》一书，他们全面地提出“无产阶级公共领域”范畴，其新颖之处在于，用人的实践经验对公共领域的不同类型加以衡量和区别。就方法论而言，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过于规范化和抽象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突出之处表现为“社会批判”（外在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内在批判）的紧密结合。哈贝马斯比较强调“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就导致了他对其实践因素的忽视或轻视，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只能限于规范层面，而未能达到预期的历史高度和社会深度。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哈贝马斯抽象地讨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冲突，把现代性危机理解为社会结构层面上生活世界传统之间的横向摩擦，忽视了社会阶级关系不平衡和权力结构的纵向冲突。由于话语政治理论没有公正地对待马克思的遗产，缺少如何为民主创造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一重要的理论环节，它的批判理论只停留在理论中，无法转变为现实的政治纲领。

最后，以伯恩斯坦、麦卡锡和克劳斯·奥菲为代表的持哈贝马斯立场者的研究。他们深受哈贝马斯的影响，对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同时，他们也对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进行了修订和补充，这些修订和补充甚至为哈贝马斯